

总编·葛继勇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

葛继勇 / 著

『清俗纪闻』研究

RESEARCH ON
SINZOKU KIBUN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葛继勇

浙江大学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博士后。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20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副主编。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东亚国际关系史和中日古典文献学等研究。



总编·葛继勇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

葛继勇 / 著

『清俗纪闻』研究

RESEARCH ON
SINZOKU KIBU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俗纪闻》研究 / 葛继勇著.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5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

ISBN 978-7-5520-2844-7

I. ①清… II. ①葛… III. ①风俗习惯—中国—清代
②《清俗纪闻》—研究 IV. ①K892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45067 号

《清俗纪闻》研究

著 者: 葛继勇

责任编辑: 熊 艳

封面设计: 周清华

技术编辑: 裘幼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s://cbs.sass.org.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15 千

版 次: 2025 年 1 月第 1 版 202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844-7/K · 719

定价: 1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问 武 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主任 王 勇(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委员 (排名不分先后)

松浦章(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榎本淳一(日本大正大学教授)
刘建辉(国际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陈 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余昊奎(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徐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胡令远(复旦大学教授)	郭连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晓峰(清华大学教授)	王志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向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铭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孙卫国(南开大学教授)	刘岳兵(南开大学教授)
潘 钧(北京大学教授)	陈小法(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牛军凯(中山大学教授)	陈秀武(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丁 莉(北京大学教授)	梁 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韩志斌(西北大学教授)	李圣杰(武汉大学教授)
于向东(郑州大学教授)	钱建成(郑州大学教授)
韩 恒(郑州大学教授)	何华珍(郑州大学教授)
葛继勇(郑州大学教授)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葛继勇

委员 黄修志(鲁东大学教授)

渡边诚(日本广岛大学副教授)

王连旺(郑州大学副研究员)

张晓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成思佳(郑州大学副教授)

楼正豪(浙江海洋大学副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
郑州大学双一流重大专项“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

总序

葛继勇^{*}

—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提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再次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地区共同应对危机、迈向美好未来,不仅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各国协同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都离不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亚洲地区拥有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等世界三大文明发祥地,古代中华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等三个古老文明都诞生在亚洲。这使得亚洲文明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以至于难以整体把握亚洲文明的共通性、普遍性。随着亚洲国家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作用日益凸显,认识研究亚洲文明、分析阐释亚洲区域关系愈显重要。

郑州大学先后获得“多卷本《犹太通史》”(首席专家:张倩红教授)、“中日合

^{*} 葛继勇,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首席专家:葛继勇教授)、“越南汉字资源整理及相关专题研究”(首席专家:何华珍教授)以及参与的“东亚笔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王勇教授)等多项有关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从文字语言的认知与变异、文献典籍的环流与再生、文物史迹的生成与流变、文学艺术的理解与对话、文化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文明思想的交融与共生等六大维度,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亚洲学”,构建融通中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的深远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面向亚洲未来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学术前沿,结合学校的学科与人才优势,郑州大学于2021年启动“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双一流重大专项,聚焦亚洲文明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协同创新体系,通过优势学科领域的交叉会聚、交互探索和融合创新,系统研究亚洲地区多元文明特质及其交流互鉴机制,探讨亚洲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构建和争端问题解决机制;努力培育重大原创成果、培养复合型拔尖人才、搭建新型研究平台,构建学科布局结构优化、学科集群优势凸显、知识创新水平升腾的创新发展模式,努力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做出更大贡献。

二

郑州大学“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双一流重大专项旨在构建不同于旁观者欧美、立足于当事人中国的“新亚洲文明观”,以贯穿地理区域、政治社会、文化文明的整体视角和多学科方法,探讨亚洲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构建和争端问题解决机制,构建亚洲国家关系新格局研究的话语体系。具体聚焦以下四大学术前沿问题:

第一,克服思维定势惯性。亚洲文明研究难免受到各国意识形态、民族立场、历史认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甚至以西方价值标准来衡量东方、叙述历史和阐释现实。要摒弃“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重视各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作用,科学系统地分析亚洲各国民粹主义、国家记忆等的根源,探索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研究范式。

第二,驳斥文明冲突言论。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秉持单边主义和霸凌主

义,以高压手段威逼,粗暴干涉亚洲各国内政,须严厉批判;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抬头,强调文明的等级、优劣与冲突,应坚决反对。今后要摒弃“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固有定式,从思想根源方面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第三,解决争议焦点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中国崛起都是一个不可阻挡、也不必引起无谓惊慌的事实。但是,我们要摆史实、讲道理,梳理中华文明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局势稳定以及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剖析中华文明秩序下的国际关系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本质异同,从根本上驳斥“中国威胁论”。

第四,探寻历史悬案真相。比如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以前,战乱在欧洲接连不断,而稳定却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常态?全面系统地研究亚洲国际体系以及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既能引导我们发现与欧洲经验不同的新现象、新问题,又能为我们审视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与国际事务提供新视野、新思路。

亚洲人的观念、身份和期望主要脱胎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世界观和知识体系,伴随着东西方人物的往来、物品的流通、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碰撞,亚洲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很大冲击,同时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需要动态立体地展开研究,在发展创新的多轨道模式下,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与疆域、中心与边界;在融合共生的多样化视角下,探讨中华文明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影响与互动,进而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新平台、“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新机制,努力促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文理念、行为规则、国际规范和制度体系。

三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是郑州大学“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双一流重大专项推出的系列学术成果之一,由“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论丛”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译丛”两种丛书组成。我们的亚洲文明研究,以中华文明为源头、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国学研究为基础、以学科交叉为方法,梳理亚洲文明的发展脉络,弘扬多元共存的亚洲价值;同时,着眼互动环流的动态史观,力

争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其中,“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论丛”主要出版以下类型的研究成果:(1)与亚洲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多样性与差异性相关的前沿研究成果;(2)亚洲文明相关文献典籍的整理、翻译与研究成果;(3)亚洲文明相关学术会议的研究报告论文集;(4)前辈学者的遗作及追思纪念论文集。“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译丛”主要出版亚洲文明相关的国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译作,当然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时,我们会通过添加译注等方式,阐明国内学者的立场与观点。出版国内外前辈学者的遗作、译作,既向前辈学者表达敬意,亦对青年学人寄托期许。

今后,我们将在思路方法上,把亚洲整体作为方法,兼顾点与面、讲究全与精,既有宏观论述,又具微观考证。在时间序列上,不局限于某一时段,而是纵贯古今,勾勒亚洲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在空间区域上,既强调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等国别文明研究,也重视东亚、南亚、中亚等区域文明的联动性;不仅梳理多元文明间的交流与影响,还探讨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冲突。

本丛书将对亚洲区域内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阐述和探讨,特别是关注 21 世纪以来学界取得的新成果、发现的新资料、关注的新问题;同时,进行有选择性、针对性的专题研究,摒弃知识偏见、学术偏见、思想偏见,努力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促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推出新的前沿学术成果,搭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热忱欢迎文明区域、文化思想、文献典籍、文物史迹、文学艺术、文字语言以及区域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学者出版学术著作、发表最新成果。希望借此平台,让我们首先在亚洲文明研究领域建成学术共同体!

丛书在筹划、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指导,以及学校学科与重点建设处、社会科学处以及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等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2023 年 2 月 15 日

序

松浦章*

《清俗纪闻》是江户时代即所谓的锁国时代日本向前往长崎贸易的唐人(中国人)询问中国江南等地的风俗、习惯、文化等,记录并添以绘图編集而成的。^①

《清俗纪闻》的编者中川忠英(1753—1830)在跋文中记载了该书的成书情况:

向者,余之在崎阳也。听政之暇,使官属近藤守重、林贞裕问清商其国之俗习,辄随笔焉,又随图焉,终成一书。^②

中川忠英是江户时代后期旗本中川忠易第五子,幼名勘三郎,字子信,号骏台。宽政七年(1795)二月至同九年(1797)二月的三年间担任长崎奉行,宽政七年七月还被授予从五位下飞弹守的官位^③。其与远山景晋(1752—1837)、石川忠房(1755—1863)并称“文政三杰”,是文政年间的能吏。远山左卫门尉景晋于文化九年(1812)至同十三年(1816)的5年间任长崎奉行^④,在任期间撰写了工作日记《长崎奉行远山景晋日记》^⑤。

中川忠英是著名藏书家,其部分藏书现存于内阁文库,约有汉籍10部、日本

* 松浦章,关西大学名誉教授。

① 村上一弥“解说”,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紀聞1》,东洋文库62,平凡社1966年版,第127页。

② 同上书,第152页。

③ 《新訂寛政重修諸家譜》卷262,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64年版,第5、40页。竹内诚、深井雅海编:《日本近世人名辞典》,吉川弘文馆2005年版,第717页。《続長崎實録大成》,长崎文献社1974年版,第2页。

④ 《続長崎實録大成》,长崎文献社1974年版,第3页。

⑤ 荒木裕行、户森麻衣子、藤田觉:《長崎奉行遠山景晋日記》,清文堂出版2005年版。

书籍 70 余部^①，汉籍中包括《大清一统志》《松江府志》《湖州府志》等清代地方志。

由中川忠英编纂的《清俗纪闻》共十三卷，宽政十一年(1799)刊行。其内容简而言之，是关于中国江南地区风俗习惯的询问调查。中川忠英在《清俗纪闻》附言中记：

本书乃询问崎阳(长崎)在住的清人彼国民间风俗，以本邦语言记录而成。古来清国东西风异，南北俗殊，切不可误认为此书所载乃清国普遍之风俗。今至崎阳之清人多来自江南、浙江，故应知此书所录多为江南、浙江之风俗。^②

即使在当今社会，如果询问日本人关于中国的地域差异，恐怕也不能得到正确的回答。江户时代同样如此，日本人很难认识到中国东西南北的地域差异。

在这样的时代中，中川忠英决心编纂《清俗纪闻》。但实际上，在《清俗纪闻》之前，中川忠英就主持编纂了其稿本《续清朝探事》^③。《清朝探事》是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5)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命令儒官荻生北溪，通过深见有邻向赴日清人朱佩章询问清朝事情，唐通事彭城藤治右卫门翻译而作成的。^④该书一直未被刊行^⑤，而中川忠英也知晓此事，故策划编纂了该书的续编。

《清俗纪闻》的内容构成如下：

礼帙：卷一、年中行事

乐帙：卷二、居家

射帙：卷三、冠服 卷四、饮食 卷五、闰学

御帙：卷六、圣诞 卷七、冠礼 卷八、婚礼

① 《改訂増補内閣文庫蔵書印譜》，国立公文書館 1981 年版，第 89 頁。

② 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紀聞 1》附言，平凡社 1966 年版，第 1 頁。

③ 西田元子：《〈續清朝探事〉について—寛政年間における清国文物への関心—》，国立国会図書館利用者サービス部编：《参考書誌研究》第 34 卷，1988 年，第 1—19 頁。

④ 同上书，第 18 頁。

⑤ 葛继勇、许浩：《〈清朝探事〉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4 年版。

书帙：卷九、宾客 卷十、羁旅 卷十一、丧礼

数帙：卷十二、祭礼 卷十三、僧徒

按照六艺之序，分六帙、六册，共十三卷，主要记载了年中行事、住居、服饰、饮食、教育、冠婚葬祭、旅行、僧侣等与中国江南风俗习惯有关的内容。

《清俗纪闻》的一大特征是使用了大量图绘。各卷绘图与文字的比例大致相当，绘图在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① 中川忠英在《附言》中记：

本书图绘乃吾遣崎阳画师至清人之旅馆随闻而绘。如有少许相违之处，清人即正之，或多作图，以示之。再三问答，始得事之全委，见者切勿生疑。^②

可见其对《清俗纪闻》中绘图的可靠性信心十足。

参与绘图的长崎画师有石崎融思(1768—1846)，其父为担任“唐绘目利”的荒木元融。石崎融思曾跟随其父学习中国画、西洋画，习得玻璃画绘法。同时跟随其父之师、担任御用绘师兼“唐绘目利”的石崎元德(? —1770)^③学习西洋画。后成为石崎元德的养子，改姓石崎。

“唐绘目利”隶属于长崎奉行，日本从国外输入名品后，必奉长崎奉行之命进行摹画^④。“唐绘目利”对输入品进行仔细描绘，从而掌握了不差分寸地还原物体的画法。另外，从中国购买的书画的鉴定、价格评定等也由“唐绘目利”负责。延宝元年(1673)任命“唐绘目利”一人，元禄元年(1688)追加一人，宝永二年(1705)增加助手一人。^⑤

唐绘目利的画法具有写实主义风格，受此影响，石崎融思在临摹时，能够对物体进行写实描绘。

① 村上一弥“解说”，载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紀聞 1》，平凡社 1966 年版，第 128 页。

② 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紀聞 1》附言，平凡社 1966 年版，第 1 页。

③ 竹内诚、深井雅海编：《日本近世人名辞典》，吉川弘文馆 2005 年版，第 59 页。

④ 永见德太郎：《長崎乃美術史》，夏汀堂 1927 年版，第 10、13 页。

⑤ 阴里铁郎编：《川原慶賀と長崎派》，至文堂编：《日本の美術》第 329 号，1993 年，第 26 页。

多模写沈南苹(之画)。今日市场多沈南苹之伪物,笔力巧妙之物多被认为是融思之模写。^①

可见,石崎融思是一位有能力的画师。

与此同时,在中川忠英的主持下,实际负责编纂《清俗纪闻》的是近藤守重。

近藤重藏(1771—1829)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幕臣(旗本)、探险家。讳守重,号正斋、升天真人。曾五次前往虾夷探险。自幼被称为“神童”,8岁熟读四书五经,17岁开办私塾“白山义学”,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有才之士,一生撰写了60余种、1500余卷著作。其父退隐后的宽政二年(1790)继承家督,成为“御先手组与力(将军侍卫)”,同时担任“火付盗贼改方(负责查办火灾、盗贼、赌博)”。宽政六年(1794),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圣堂学问所(1797年改名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类似于科举制的考试),并受到了褒奖。宽政七年(1795),担任“长崎奉行手付出役”(长崎奉行的文书助理),受奉行中川忠英之命编纂《清俗纪闻》。其在长崎期间还撰有《安南纪略稿》等著作,并献与奉行。^② 宽政九年(1797)四月,随着中川忠英转任勘定奉行,近藤重藏跟随其回到江户,同年十二月,近藤重藏转任“支付勘定方”(负责财政工作)。此外,中川忠英兼任“关东郡代”(负责关东地区的民政)时,近藤重藏还受命担任“关东郡代付出役”(关东郡代的助理)^③。

另外,参与《清俗纪闻》编纂的清人有:

清国苏州 孟世焘 蒋恒 顾镇
湖州 费肇阳
杭州 王恩溥 周恒祥
嘉兴 任瑞^④

其中关于“孟世焘”,撰成于文政年间(1818—1829)的《长崎名胜图绘》卷二下“唐

① 永见德太郎:《长崎乃美术史》,夏汀堂1927年版,第13页。

② 竹内诚、深井雅海编:《日本近世人名辞典》,吉川弘文馆2005年版,第394页。

③ 同上。

④ 村上弥“解说”,载孙伯醇、村上弥编:《清俗纪闻1》,平凡社1966年版,第153页。

馆”条载：

孟涵九，名世焘，字涵九。亦为浙江省乍浦人。……宽政时，于长崎馆中，学日本伊吕波假名，临模古歌等，若有乞书者，专书而与之。^①

孟涵九书写假名的画面见于同书中的插图“孟涵九假名书”^②。孟世焘字涵九，长崎贸易相关史料中记载有孟涵九之名，其曾是享和三年（1803）王氏番外船船主^③。正如此处的“孟涵九，名世焘”之例，日本史料中多以孟涵九记载，而很少见孟世焘的记载。

《清俗纪闻》内容虽以风俗习惯为主，但也可见清朝社会实际使用的官方文书，即卷十“羁旅行李”中收录的“船牌”。乾隆六十年（宽政七年，1795）九月颁发的“平湖县印照”“粘县牌挂号之图”、同年十月颁发的“联单”、同年十月颁布的“部牌”、同年十月颁发的“浙海关船照”以及浙江布政司颁发的“宪照”^④。颁发时间均为乾隆六十年，与《清俗纪闻》的成书时间相符合。关于“船牌”，《清俗纪闻》载：

民商至外国通商时，如为海路，则需向当地知县申请领取船牌。此船牌共四张，来自抚院的称为“部照”，来自布政司的称为“司照”，来自知县的称为“县照”，来自海防厅的称为“厅照”。民商持上述四张牌照至渡口的坝汛，申请货物及牌照检查。此时由塘汛将盖有当地政府印章的纸张粘在县牌上，此称为“挂号”。^⑤

关于“挂号”，有如下重要记载。浙江嘉协右营“挂号”中载：

① 长崎史谈会编：《長崎名勝圖繪》，长崎史谈会 1931 年版，第 243 页。

② 同上书，第 238—241 页。

③ 大庭修编：《唐船進港回棹録・島原本唐人風説書・割符留帳——近世日本交渉史料集》，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 1974 年版，第 263 页。

④ 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紀聞 2》，平凡社 1966 年版，第 92—102 页。

⑤ 同上书，第 148—149 页。

该船于六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到口,十月二十五日将药材等出口,往东洋。^①

此后,浙江乍浦海防分府“挂号”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查验船户范三锡于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装载红铜进口。于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装糖、药材等货物出口,带食米一百石往东洋。^②

虽然日本方面的史料中未见范三锡之名,但在有关清朝中日关系的史料中却可见“船户范三锡”的记载^③。

浙江海关“商照”中载:“接办官商钱鸣萃之子钱继善采办铜斤。”^④其中可见中方货主的名字。天明八年(1788)办铜官商由王正荣变为钱鸣萃^⑤。《续长崎实录大成》卷八“唐船进港并杂事之部”宽政八年(1796)条中载:“钱氏去年至限。”^⑥可见,钱鸣萃担任官商的最后一年是在宽政七年(1795),也就是说,天明八年(1788)至宽政七年(1795)的七年间,担任办铜官商的是钱鸣萃。“商照”的颁发日期是乾隆六十年(1795),此时的办铜官商正是钱鸣萃,可见《清俗纪闻》的记述是准确的。另外,“宪照”中记载的“行商费顺兴”“商伙费顺兴”^⑦曾于宽政五年(1793)作为丑四番船船主前往长崎^⑧,通过长崎留存的其他记录,可知费顺兴还于宽政三年(1791)九月到同八年(1796)四月前往长崎^⑨。

总之,“船牌”既是当时中日铜贸易的重要证据,也在明确清代船舶出洋经商手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⑩

① 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纪闻2》,平凡社1966年版,第95页。

② 同上。

③ 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的研究》,朋友书店2002年版,第285、290、292页。

④ 同上书,第98页。

⑤ 同上书,第150—151页。

⑥ 《续长崎实录大成》,长崎文献社1974年版,第198页。

⑦ 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纪闻2》,平凡社1966年版,第102页。

⑧ 大庭修编:《唐船进港回棹录·岛原本唐人风说书·割符留帳——近世日本交涉史料集》,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4年版,第260页。

⑨ 孙伯醇、村上一弥编:《清俗纪闻2》,平凡社1966年版,第114页。

⑩ 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的研究》,朋友书店2002年版,第583—598页。